



▲2月4日，武汉火神山医院开始收治确诊患者，医护人员将患者送入病房。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

口述：肖静 | 49岁 | 网店店主 | 武汉
整理：张宇琪 | 本报记者
编辑：黄海波

现在，我在家陪着10岁的女儿上网课，一天三顿变着花样给她做好吃的。因为疫情的缘故，难得闲下来，和老公女儿晒晒太阳，享受着生活的烟火气。

但今年春节的那次遭遇，至今回想起来，难免还是心有余悸。

春节前，我和女儿订了一张日本观光邮轮票，航程共6天5晚。按照正常的行程，这艘邮轮回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的时间，应该是大年初一早晨。

可谁曾想，船上有15个人出现发热症状。而且，包括我和女儿在内，船上有148名湖北籍旅客。当时，疫情不断升级，我们这邮轮要靠港简直太难了。

没错，我乘坐的就是“歌诗达赛琳娜号”——一艘引发很多人关注的邮轮。

本来，在大年初一早上，我醒得挺早。想着邮轮要到港了，终于可以和女儿结束旅程，开开心心地回家了。

当时，对疫情也有一点担忧。由于邮轮上没有信号，之前靠泊日本佐世保港时，我才听说武汉“封城”的消息。但没想过疫情后会这样严重。

通关入境日本时，我虽然不认得日文，但看到不少牌子上，都写着“武汉”两个汉字。听说我和女儿来自武汉，日方人员测量体温时，就会重点关注。

返回天津靠港的前一天，我们在邮轮上看了春晚，竟然有临时增加抗击疫情的特别节目。看到这一切，我更加担心了起来，当时就想着赶紧下船回家。

大年初一早晨，收拾妥当行李后，我把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叫上隔壁屋同行的朋友，一起去餐厅用早餐。

早上7点多，用餐的时候听到广播响起：天津海关已经上船检查，所以暂时不能靠岸，请大家在各自的房间等候。

当时，不少人跑到服务台去问，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什么时候能下船。不少人已经订好了高铁、飞机或酒店。我和女儿也准备先去北京，再坐飞机回武汉。

餐厅里旅客们开始议论纷纷了，说什么“好像船上有发热病人”“听说有穿防护服的人上船检查”“要是查出被感染者，所有人都无法上岸”……感觉大家有些恐慌了。

我和女儿也没办法，只能回到房间里，等待海关进屋来检查。虽然心里挺害怕的，但又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干等着。

女儿一直问我，“妈妈，我们为什么不能下船了”。我只能一遍遍安慰她。

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喊，“来了，来了”。我推开门，看见走廊那头，两名全副装备的医

「歌诗达赛琳娜号」，我就在这艘邮轮上

人员正挨个敲门。

那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，看到全身穿防护服的人，感觉像是电影中的场景一样。我愣了愣神儿，又关上门等着。

过了一会儿，敲门声响起，全身防护服的人站到了我面前。他们说话很和气，测完体温，又详细询问了我们近期的旅行居住史和密接人群。检查过后，说了一句“谢谢配合”，轻轻带上门离开。

过了一会儿，又听别的房间里有人议论，说刚才有直升机飞过来了。不一会儿，大家又在聊，“海关已经把发热人员的样本采集完，由直升机送走了”。

在船上潦草吃了点午饭，我们又返回房间里，一直等待着。船上大部分游客，表面上保持着镇定。所有人都心照不宣，只要有人感染，大家恐怕都要隔离。

我们的房间没有窗，待久了觉得压抑得很。我已在心里做着最坏的打算，如果船被隔离，不知多久才能回家。

想到这里，我又开始有些后悔了——当初预订邮轮时，为了省点儿钱，没订带窗和阳台的房间，实在不应该。

害怕、焦虑、后悔、无奈、压抑，一时间心里五味杂陈，不知道未来会向什么方向发展。

后来，听朋友说，甲板上有微弱的信号。我就穿了件厚衣服，登上甲板给家里人打电话。

海风呼呼地吹，特别冷，我只能用断断续续的信号大声喊，告诉家人自己和女儿怎么样了。

等着等着，已经到了晚上了。听说上午采集的样本，都是阴性的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晚上8点多，邮轮上的旅客陆续下船了。

下船后，我和女儿，还有其他湖北籍的旅客，被天津滨海新区政府安排到一个酒店隔离。酒店环境挺好，住进去感觉挺安心的。之前一直在邮轮上漂着，终于能踏实地在陆地上，睡个好觉了。

当地政府对我们很照顾，酒店服务员也很热情，没有人因为我们是湖北人，而有什么推阻躲闪。

每天两次，有人提醒我们量体温。酒店每天提供不重样的餐食，还问我们想吃什么，说是会给我们做，感觉很温馨。

我也一直关注着武汉的情况。家里人都劝我，说武汉疫情严重，如果能在天津多待几天，尽量晚些天再回来吧。于是，我和女儿就在酒店安心住下了。

就在天津待到2月22日，我们才回武汉。到家后，每每想起邮轮上的经历，虽然有惊无险，却也把人折磨得够呛。

自此，也对天津有了一份新的情感。想着疫情结束后，一定要再去一次天津，好好看看这个城市。

口述：汪诚 | 34岁 | 工程师 | 北京
整理：程露、黄燕 | 本报记者
编辑：完颜文豪

春节回湖北麻城老家，除了看望老人，岳父母还有一个安排：参加他们外甥的婚礼。但这突如其来的疫情，给婚礼蒙上了阴影。

远在宜昌某武警部队的新郎，可能无法按计划回家成亲了。

但新郎的父母——我妻子的舅舅、舅妈觉得，喜帖发出去了，喜宴也定好了，再改不方便。老两口打算让妹妹代替哥哥，跟新娘完成婚礼仪式。

妻子回麻城后，越想越不放心，不赞成这时还搞大型聚会。她给舅舅和表弟发信息，劝他们取消婚礼。

大年三十的早晨，满桌的菜肴，却没有一个人动筷子。

在焦虑与不安中，我们全家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：立即返京。

父母和妻子匆忙收拾行李，连亲戚朋友送来的土鸡蛋、老米酒等特产，都来不及装进后备厢。安顿好80多岁的奶奶后，我们驱车一路向北。

上高速两小时后，麻城，这个湖北省黄冈市下属的县级市，宣布关闭离城通道：火车站关闭，高速公路出入口实行交通管制。

我摸摸羽绒服口袋里还没来得及退掉的高铁票，吓出一身冷汗。

原本，我们计划带着3岁半的儿子，初四坐高铁返京。由于新冠肺炎疫情，退了两次票，最后换成大年三十下午的票。

如果不是开车，我们可能就走不了了。时间回到1月21日，专家已经确定新冠肺炎传人。我和妻子商量，从北京回老家的路线，改从安徽六安转车，不走武汉了。

次日一早，我们一家三口戴着口罩，背包里装着家中所有存货——大概十几个口罩，赶往北京南站。同一天，我的父母和岳父母，分别自驾从北京出发去麻城。因为担心十几个小时的车程太长，小孩子坐不住，我们就没有跟他们同行。

很多人说我们一家人心真大，现在想来也很后怕，出发前并不知道疫情如此严重。

我平时工作忙，除了过年，很少有机会回老家看望奶奶。我从小跟着奶奶长大。几年前，奶奶得了阿

尔兹海默病，记得的人越来越少。

今年，我妻子的爷爷病重。这次，我们老小7口回老家，也是为了见老人最后一面。

早晨5:30的火车站，等待安检的队伍排到了站外。大多数人都戴了口罩。

小孩子总是充满好奇，喜欢到处摸碰。候车时，妻子全程攥着儿子的手，只要他碰了什么，就要用口手湿巾给他擦。湿巾还是婴儿专用的，不含酒精成分。

上车后，我收到公司HR的信息，要统计春节从武汉路过的职员名单。看着手机上不断弹出的疫情信息，我有些后悔。

或许，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。

车厢里几乎没人戴口罩，不时传来几声咳嗽。每听到一声，我和妻子的神经都会绷紧一下，把孩子抱得紧紧的，一路倍感煎熬。

下午3点多，我们终于抵达麻城火车站。这里距疫情最严重的武汉，也就两个多小时车程。

但小城里的多数人，还沉醉在过年的喜庆氛围里。人们拖着大包小包涌出车站，目的地只有一个——家。

来接我们的伯伯并没有戴口罩，丝毫没有感觉到危险。

到家后不久，我的父母也开车抵达。岳父母直接回了距麻城40公里的木子店镇。

从这一刻开始，全家讨论的话题就是疫情。信息如潮水般涌来，或真或假，年轻人坐立不安，老人将信将疑。

第二天，我们开车到木子店的一个小村庄，与岳父母会合，看望妻子的爷爷。老人状态不太好，只能卧床。

在农村，几乎没人戴口罩，大家忙着备年货、打麻将、串门聊天。

为了戴不戴口罩、要不要提前回京的事情，妻子和岳父争吵了几次。岳父说：“哎呀，别大惊小怪，没事儿！”

1月23日上午，一个爆炸性的消息，惊醒了麻城的许多人——武汉，这个省会城市，关闭了离汉通道。

人们开始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，不敢随便出门。妻子一会儿觉得自己嗓子疼，一会儿觉得自己发烧了，一天给儿子测五六次体温。

当天，麻城发布通告，要求居民不要举行拜

“家乡的地图被我染红了”

从武汉回老家过年的我，成了小县城的“一号病人”

口述：李叶子 | 33岁 | 保健老师 | 山西
整理：完颜文豪、薛园 | 本报记者
编辑：刘荒

活了30多年，从没想到我们一个小家庭，竟然牵动了整个县城的神经。

我们这个山西南部的小县城，只有40多万人口。这次疫情暴发以来，共发现3例确诊患者。这里面有两个都在我家，也就是我和我妈。

从武汉回老家过年的我，成了我们县里的“一号病人”。我们的病情，都快成了县里面最大的事，全县人民的心都跟着悬起来。

听说有一天，县委书记在例会上，说到疫情期间老百姓的配合与认可，动情得差点落了泪。

虽然我也是无辜的，听到这些总觉得挺歉疚的——毕竟是我先带回来了疫情，家乡的地图被我染红了。

好在，我们自己家的难关过去了。一周前，我和妈妈相继治愈出院了。为了慎重起见，县里还专门找个宾馆，让我家人去集中隔离一段时间。

此刻，我住在宾馆隔离。靠在窗边晒太阳吹吹风，心想“终于熬过来了，活着真好！”

妈妈住在另一个房间里，虽不能照面，但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她还像过去一样乐观，跟闺蜜们开着视频聊天，有说有笑的。

随着疫情下的紧张感慢慢消散，小县城渐渐恢复往日的平静。回过头想想这些天，简直就像做梦一般。

1月19日，我带孩子从武汉回山西老家，老公晚些时候才开车过来。

当时，武汉已经有了疫情苗头，说的不明原因肺炎。具体情况我不大了解，跟很多武汉人一样，也就没有太当回事儿。

到了老家，看到电视里采访钟南山院士，联想到以前的“非典”，我还发了一条朋友圈感慨——“要敬畏自然”。

万万没想到，此时我已把病毒带回老家来了。家乡的小县城三面环山，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的人们，还开玩笑说：“易守难攻，病毒进不来。”

没过两天，我开始发低烧。因为我是保健老师，身体一直很好，就没往坏处想。服药后仍不见好转，就打算去社区卫生所，找医生打一针。

出门前，想起钟南山说“病毒存在人传人”，就特意戴上了口罩。现在想来，当时这一念之间，说不定减少了多少病毒传播的风险。

23日，一早醒来，武汉“封城”。我这才感觉事态严重，开始怀疑自己中招了，又害怕已传染给家人了。爸爸赶紧送我去县医院。我还幻想着拍个片子排除一下，图个安心。

我如实告诉医生，自己从武汉返乡。随后，进入发热门诊隔离，县医院拿不准病情，又联系省里专家远程诊断，当天诊断为疑似病例。

第二天，检测结果出来，我被告知确诊为新冠肺炎。不知道是地方太小，还是这件事情太大，我确诊不到2小时，就有人找我同学打听情况。

县里的疫情公告还没发，很多在北京、深圳，甚至国外的老乡们，都知道我的名字了。

一位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朋友对我说，内部早就传了话：一旦有确诊病例，就要提高防控措施，县城

年、集会等活动，妻子表弟的婚礼不得不取消了。

接下来怎么办，走还是留？无论是对我们，还是我们的父母，这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。

如果按原计划初四返回，一旦麻城也关闭离城通道，孩子怎么办？如果马上走，妻子的爷爷身体状况不好，也让我们很担心。

夜里，岳父的单位通知他早点返京。第二天，也就是大年三十的早晨，我们最终下定决心走。

为减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感染风险，我和妻子决定同老人一起自驾返京。

我父母的车刚上高速公路，轮胎就出了问题。考虑到小孙子，他们让我们换乘岳父母的车继续走，他们返回城里修车。

非常幸运，他们找到了一家修车铺。没想到，大年三十还开业。

换过新轮胎后，我开车空了，还跑回家装了一些土鸡蛋，要带回来给孙子吃。他们重返高速不到一小时，麻城也关闭了离城通道。

一路上，岳父极少摘下口罩。路上的车很少，没出湖北的时候，我们总担心，随时会被交警拦回去。

北上的路途让人揪心。我们尽量减少进服务区区的次数，孩子撒尿就用矿泉水瓶接着。

后来，车开到豫冀交界时，高速封路了。交警把所有的车拦进服务区，看我们是北京牌照的，就放行了。

开了12个小时的车，我们终于到了北京，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。

晚上，坐在北京的家里，春晚刚开始不久，一家人饥肠辘辘。岳母在厨房忙碌着做点简单餐食。我们开始了居家隔离的日子。

每天早晨，我和妻子醒来的第一件事，是查看新冠肺炎感染人数，然后向社区和单位报告体温。我们更加牵挂远在湖北的亲人。没想到，噩耗很快传来，妻子的爷爷大年初六去世了。

由于封路，岳父回不去。疫情笼罩下，没有葬礼，没有宾客。前几天岳父还说，晚上梦见了他父亲，哭湿了枕巾。

家人在哪儿，家就在哪里。比起一些人，我们这个家庭是幸运的。

从麻城归来后，我们只能暂时被迫宅在家里，而妻子的爷爷和那些逝去的人，却被永远困在2020年这个冬天。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汪诚为化名）